

評吳安家著《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 與持續（1949-2003）》 臺北：國史館，2004年1月。830頁。

蔡昌言*

在中共採取閉門鎖國政策、兩岸關係晦澀不明的年代，中共傳統黨政研究（或稱北京學）的成果不單可以幫助執政者瞭解中國大陸政治現況，並可進而成為其據以制定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此外，中共傳統黨政研究也是從事中國大陸研究領域的法政學者之研究主流，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在那個國家意識優先、資訊流通緩慢、社會組成元素單一的時代，無疑地深受知識分子以及普羅大眾的關心與重視。中共傳統黨政研究一方面滿足當時人民極欲瞭解中國大陸政經發展的資訊需求，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也引領時居臺灣的不同族群居民，窺伺海峽彼岸那些與我們流著相同血液、分享共同文化、記憶相同歷史的同胞們，到底用什麼方式進行著政治生活，而其政治生活的方式和居於寶島臺灣的你我又有何相異或相同之處。

曾幾何時，時代變遷的洪流已悄悄的吞噬海峽兩岸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樣貌。1980年代以來，全球化浪潮全面衝擊人類生活的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科技、傳播、以及心理等各個層面，同時也改變了我們汲取資訊的方式與興趣。在資訊封閉的年代，知識市場上值得投注心力的學術領域相對而言顯得侷限，影響所及，中共傳統黨政研究因此吸引著較多學者競相投入，以便一窺海峽彼岸發展的堂奧。然而在資訊快速流動的現今，知識洪流呈現爆炸，許多新的學術學門以嶄新的風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貌向學術菁英招手呼喚。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的神秘面紗也隨著政策改變與時代變遷，逐一卸下層層防護，使得有興趣瞭解中國大陸現況的人士不再需要依賴中共傳統黨政研究成果，便能透過新聞媒體以及網路等提供的即時訊息，隨時掌握第一手政經資訊，從而抓住大陸中共政權的脈動。上列因素影響所及，近年來臺海兩岸的中國研究學術社群已經很難見到關於中共傳統黨政研究的學術巨擘誕生。取而代之的是，其他議題如宗教、教育、農業、國營企業、經貿、以及外交關係等領域的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筆者以為，吳安家教授所著《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一書的誕生，恰恰填補了因過去十多年中共傳統黨政研究投入者日益稀少所留下的學術空白。它不單喚起學術界對「北京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回憶，同時也讓你我身處全球化時代下，資訊快速流動所形成的浮動情緒，有一個紓澀反思的機會，來瞭解究竟中國大陸在過去五十多年，其當政者的意識形態有那些變遷與不變。

整體而言，本書採用「以年繫事」的體例撰寫方式，把 1949 至 2003 年間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先分成三大段落(即 1949 至 1981 年、1982 至 1991 年、1992 至 2003 年)，然後逐節分析每個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經過與影響。這個研究論文寫作方法，筆者認為乃融合「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approach)、「文獻分析法」(library approach)、以及「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approach)等三個研究方法。在中共傳統黨政研究領域中，做類似研究方法結合的中國大陸黨政經典文獻不在少數，¹但是在時間縱軸上能夠一口氣橫跨超過半世紀的論著則相當少見。吳教授一方面以極為深厚的中共史學根基做為本書的論述基礎，另一方面旁徵博引許多中共政府內部、中國大陸學界、中國媒體、美國媒體、美國政府、我國學界、以及我國政府等眾多單位出版的各類文獻，在去蕪存菁後擷取寶貴可用的資

¹ 例如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吳安家：《中共政治發展》等。

訊，用以佐證中共意識形態的歷史發展軌跡。最後，吳教授在斷代上以 1981 年與 1991 年作為比較分析的關鍵年份。在象徵意涵上，吳教授認為 1981 年，中共舉行「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毛澤東一生功過蓋棺論定，因此選擇該年份做為共產主義的實驗與修正的終結年代。至於 1991 年，中共內部曾就有關改革開放是「姓社」還是「姓資」，進行激烈的爭論，因此中共內部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如何共存或互斥，在 1992 年後才能算確立方向，至少在經濟層面逐漸往「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左經右」方向大步邁進。透過這個意識形態變遷的年代劃分，吳教授得以精確的透過比較研究途徑，審慎評比中國大陸不同時期意識形態產生那些微妙的變化，又有那些意識形態成分是亙古常新的。筆者認為，有效結合「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以及「比較研究法」等三項研究方法，是本書首要成功之處，它看似容易簡單，但其中所需具備的紮實學術訓練根基，實非其他領域學者所能想像。

為何研究並瞭解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是中國研究領域中重要的議題？作者認為，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之前，中國共產黨就極為重視並宣傳意識形態，以加強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化。中共希望藉由思想的傳播以及政權影響範圍的極大化，能夠使這一全能系統擁有前進的動力，也造就了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五十餘年的政權基礎。然而，五十多年的極權統治，在各個不同階段一定有其不同的社會需求，如何適時調整政治意識形態的內涵，進而使民怨獲得釋放、反對力量獲得緊縮，是中共政權一貫思考的重要面向。

總體來說，關於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部分，作者指出從 1950 年至 2003 年間變化最大的包括下列六項：1.由否定資本主義轉變為肯定和利用資本主義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2.由否定商品、貨幣及市場經濟思想轉變為肯定商品、貨幣的作用及市場經濟制度；3.由加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極端主義轉變為主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主義；4.由否定企業主入黨轉變為歡迎企業主入黨，並把企業當作先進的社會階級之一；5.由否定

私有財產制度轉變為主張修憲肯定私有財產制度；6.由壓制民主化的主張轉而適度容忍。從吳教授歸納出的上述六項變遷點，我們可以發現至少有五項是和經濟制度與事務直接相關。如果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其首要目的是為執政權的永續存在而服務，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本書在此已直接點出中共政權之所以能存留至今，主要關鍵因素實在於中共政權一直調整步伐，在經濟改革事務上實事求是、謹慎以對，力求十二億人口不在經濟發展上產生太大的問題與矛盾，從而能有效降低其對於政治穩定、社會結構、甚至領導核心權力繼承所帶來的可能衝擊。筆者必須指出，這個強調意識形態改變與否憑依的經濟觀點，在中共傳統黨政研究領域中並非居於主流，但是在國際學術研究社群，這個看法卻和解釋國家政權民主化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有著若合符節的論述。吳教授在研究中共政治意識形態的變遷項目上所強烈暗示的經濟背景因素，而非演繹出傳統看法的派系鬥爭、權力繼承、或政治社會背景因素，實值得中共黨政研究領域的同好深思。

中共如何在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與權力鬥爭中，站穩腳步使其政權不至於瓦解，並維繫廣大人民對中共政權的信心？吳教授認為，中共意識型態的不變之處主要是下列幾項：1.中共領導人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2.中共領導人仍然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3.中共領導人仍然反對西方政治制度，如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兩黨制或多黨制、三權分立制、議會制度、競選制度等；4.中共政權仍使用「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以及「公安部隊」等強制與脅迫的專業手段控制社會，並將暴力的使用制度化；5.中共政權仍反對媒體自由化。上述五項意識形態不變之處，都集中在政治運作、社會控制、以及資訊取得等層面，力求透過這些層面的封鎖與鞏固，能使中共政權有效延續。就這些研究發現而言，吳教授在政治意識形態不變的部分並沒有太多與其它類似研究有不同之處。因此，我們必須瞭解的是，任何有助於鞏固中共政權領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都是中共必定堅持之處；相對而言，任何有害於中共政權維繫的新思維，都將遭受中共的打壓

與迫害。

吳教授在整理出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不變之各項因素後，認為一黨專制所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經濟資源與政治權力的壟斷，以及意識形態的強力支撐。殷鑑於此，吳教授認為隨著經濟改革背景因素的逐漸深入，中共政權的基礎會逐漸腐蝕，並逐漸發生「質變」，其中包括：1.等級產權制逐漸瓦解；2.「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階級基礎將逐漸瓦解；3.意識形態的控制將逐漸失靈。基本上，上列三項質變到目前為止只有第一項正逐漸產生，其餘兩項雖有若干徵兆，但至今不見實質發展。三項質變對照在現實世界所產生的不同落差，至少引領出兩項值得討論的議題。首先，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未來發展前景到底是光明亦或晦暗？事實上，本書在第四章中也以一節的篇幅論述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展望，其中吳教授認為決定中國未來民主運動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主要有下列七點：1.中共領導人能否虛心地接受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優點；2.軍隊能否支持民主運動（或至少採取中立的態度）；3.知識分子和學生能否有計畫地深入基層民眾，宣傳自由民主的理念，以團結二億多的工人和九億多的農民，共同為促進全中國民主化工作而努力；4.中共能否徹底改造經濟制度；5.中共能否徹底變革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6.外國人能否有技巧的協助民運人士推動中國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工作；7.臺灣的政經建設能否繼續獲得輝煌的成就。就這七項因素而言，前五項因素是中共官方為維繫中共政權而在意識形態上面絕對不會退讓改變之處，如果吳教授在中共意識形態的不變之處研究成果正確，是否在此暗示著中共政權的民主化將面臨極大困難？又或者中共意識形態的不變之處在過去的歷史發展有著極高強度，但面對未來的歷史進程，這些不變之處極有可能產生書中所提的三項質變，從而使得中共民主化的進程有機會全面開展？筆者以為，這些問題都是本書所間接提出，而值得吾輩深思的。

其次，三項質變產生後對中共政權產生的腐蝕，是否適合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成功與否做結合？換言之，吾輩面對中共政權的權力基礎逐漸遭

到侵害，應該關心的重點到底是質問 so what？還是一廂情願的認定一旦中共政權分崩離析，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花朵便必定四處綻放？事實上，自從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陸續發表「南巡講話」以來，中國大陸過去十多年的整體發展在改革開放的大纛帶領下，已經產生極為快速的轉變。許多人民在經濟發展的浪潮下，意識形態一方面逐漸淡化，但另一方面，對政治參與的熱情以及中共一黨控制的不滿卻也逐漸消失。他們所追求的是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然而這美好未來的藍圖卻刻意忽略政治的成分。換言之，人民或許認為只要中央政府能提供更好的經濟生活、更完善的居住環境、下一代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基本上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不一定非得驚天動地、大費周章的進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如果抱持這個想法的人民逐漸增加，那麼我們必須嚴肅思考，書中所提出的三項質變與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的因果關係似乎將無法有效聯結，從而使得關於如何促進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的學術研究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

儘管本書具備蒐集資料豐富、研究命題清楚、研究方法多元且有效結合、以及研究結論正確詳實等眾多優點，但本書仍留下兩個有待進一步討論的議題。首先，本書在第一章所提出的三項假設，²到底是研究設計中的「假設」(hypothesis)？或者是貫通全書論述的「前提」(premise)？筆者淺見以為，吳教授所提出的三項「假設」，一方面並未在後續文章中予以檢驗，二方面其假設本身並未具備待驗問題的疑問成分，反而像是支撐本書觀點的重要礎石。因此，書中所提之「假設」，似乎是意指全書論述觀點的「前提」，而非社會科學中會於文章中系統檢證的「假設」。其次，中共為維繫意識形態的單一完整性，常採取許多運動或政策以鎮壓不見容於當局的團體。其中，自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權對「法輪功」團體

² 這三項假設分別為假設一：中共黨員是道道地地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它們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假設二：意識形態必須訴諸於政治運動，利用政治運動來達成它的理想和目標。假設三：中共政權仍舊是馬列主義式的獨裁政權。

及其所提倡的「法輪大法」的壓制行為，是歷時最久、受鎮壓人數最多、影響層面最廣的事件，其發展直至今日尚未告一段落。法輪功的影響不單侷限於宗教層面，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也強烈挑戰中共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的全面掌控，從而使得中共在過去數年一再進行鎮壓行為。本書針對法輪功及其相關影響，並未做出整理與分析，若能加入這部分的論述，相信一定能夠更加完善全書的觀點，使得本書的完整性更加周延。